

017

廣陵文苑



第 1 期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1986)

政协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

目 次

“三·一八”惨案和朱良钧烈士.....陈朝刚执笔 (1)

有关万福桥惨案的历史记载.....杨振基 丁久均 (5)

扬州盆景.....赵庆泉 (8)

杨氏小筑.....杨穆春 (13)

• 文献转载 •

扬州警察.....张治中 (14)

“三·一八”惨案和朱良钧烈士

陈朝刚执笔

今年是“三·一八”惨案六十周年。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发生了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遭杀害的四十七人中，年龄最小的是原籍扬州、当年随父就读于北京清明中学的朱良钧，时年仅十六岁（虚岁）。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是由于北洋军阀仇视国民军拥护南方革命政府并支持学生运动而引起的。“三·一八”前夕，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利用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由日本派遣军舰驶进大沽海口，奉鲁军舰暗随其后，以一举消灭国民军，夺取京津地区。他们的罪恶用心被识破，国民军布雷封锁了海口，阻止敌舰入侵。日本侵略者见阴谋不能得逞，悍然命令其军舰炮击我大沽口岸；日、英、法、美、比、荷、意、葡等八国公使团还联合行动，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我撤去对大沽海口的封锁及塘沽水雷，并以“最后通牒”相威胁。全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挑衅和执政府的卖国投降，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员会书记李大钊和国民党北方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主席徐谦等人的领导下，一场反帝、反军阀的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声讨日舰炮轰大沽口岸和各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通过了驳斥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

决议。会后示威游行，向执政府请愿。愤怒的工人和青年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辛丑条约！”等口号来到执政府前，要求段祺瑞接见，坚决不承认《辛丑条约》，拒绝《八国通牒》。可是，段祺瑞断然拒绝群众的正义要求，竟下令武装军警对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开枪射击。刹那间枪声四起，血肉横飞，呼号声震撼云霄，许多热血青年倒在血泊之中，血染大地，惨不忍睹，连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也称之为“兽性”的“惊人惨案”。事后经中国济难会调查，死难四十七人，伤者三百余人。

“三·一八”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仇恨。中国共产党在三月二十日为“三·一八”惨案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段祺瑞，用武装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各地区工会、律师协会、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声罪致讨。天津、上海等地的人民群起集会示威。革命的声势迫使段祺瑞于四月间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北洋军阀历时十五年的黑暗统治，从此开始土崩瓦解。

朱良鈞烈士年轻志高，热爱祖国，投身火热的革命运动，以身殉难，决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在北京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潮影响外，还和他的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他的家庭在当时可以说是海军世家，父辈三人早年投身海军。他的父亲朱天奎、伯父朱天森均毕业于清末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兄弟二人还以优异成绩考取以官费攻读于英国伦敦海军大学，较早地吸取了西方科学文化和军事知识。他的叔父朱天昌毕业于烟台海军学堂，历充北洋舰队舰长、参谋；一九二三年追随广州大本营革命政府，任同安舰舰长；陈炯明叛变时，曾率领全舰官兵护卫孙中山先生的安全。其父朱天奎从英国留学归国，先后在北

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海军中任职。朱良钧烈士生在扬州，幼年随父到北京读书，从小诚实厚重，沉默寡言，思想敏捷，读书勤奋。在家庭中，他和同辈兄弟常常听到父辈谈论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政治腐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等现实情况，使他思想上孕育着打倒列强、洗雪国耻、铲除军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所以他怀着满腔热血，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直至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

朱良钧牺牲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根据烈士家属的要求，于一九二八年冬将烈士灵柩运回故乡扬州，安葬在北郊黄金坝西北小土山上。墓前有牌坊、墓道和烈士纪念碑，碑文上款为：“戊辰年仲冬月”，下款为：“江邑乡人公立”，正中隶书“三·一八朱烈士良钧墓”九字，四周植有苍松翠柏。整个墓地幽静秀致，庄严肃穆。但由于年久失修，加之十年动乱，烈士的牌坊被毁，墓冢被平，棺木外露，墓碑虽存，却已淹没在杂草丛中。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各项政策逐步落实。在扬州市委、市政府及市文管会的关怀下，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朱良钧为民主革命牺牲的二十位扬州籍烈士之一，烈士墓列为市级保护文物。墓地用砖石水泥重新整修，墓前砌有圆形大门，墓旁筑罗圻登台，石碑屹立其间，焕然一新，供后人凭吊。

朱良钧烈士殉难已经六十年了，烈士生前的理想、追求，如今已成为现实，祖国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若烈士英灵有知，自当含笑于九泉。只是烈士的两位胞弟，还分居大陆、台湾两地，人为的分隔，使他们几十年来没能见面，更未能一道来墓前悼念。我们相信，随着“一国两制”的推行和海峡两岸人民的接触，祖国的统一大

业必将实现，烈士的骨肉兄弟必将团聚，这是无疑的。我们有信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后记：本文根据烈士的胞弟朱良谟、堂弟朱良泰二位老先生提供的史料，同时参阅纪念“三·一八”六十周年的有关文章以及《纵横》等报刊资料加以整理而成，谨向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谢意。

（上接第7页）

② 杭田富是在回家不得入城时，碰到“维持会”的人把他带进城，而决不是万福桥遇害者中有什么“维持会的成员”。

③ 杭田富虽没有象卞长福那样亲身参与被屠杀的行列，但他亲耳听到万福桥方向的一阵阵枪声，并在第二天亲自听说“万福桥下廖家沟里，到处都是浮尸，共有四五百人之多”，这就为万福桥惨案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旁证。

综上所述，万福桥惨案铁证如山，是血的史实。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爱好和平的人民是远不会忘记的。

有关“万福桥惨案”的历史记载

杨振基 丁久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侵华日军在仙女庙到扬州之间的万福桥上屠杀我无辜同胞四百多人，酿成震惊苏北的“万福桥惨案”。关于这一事件，历史上多有记载，兹略举于下：

一、参加过《清史稿》编写工作的扬州学者陈含光，抗战爆发后寓居扬州，闭门写作，敌人暴行，亲闻目睹，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其子陈康博士特由美国寄回陈含光先生当年写作遗稿，在《再报素友书》一节中记有日军入侵扬州时的暴行：“……或有役事，拦街捉人，尝役四百夫至仙女镇，给妇令归。途遇他队，邀而杀之，免者三十而一……上悲华夏，内恸友于，旁惨素友，痛当奈何！痛当奈何！苟生亦复何赖？”（见《扬州文史资料》第五辑158页）

二、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江都县党部和县政府编印了一本《江都县城沦陷二周年纪念册》，书内收有县情报处主任周秋如所写《倭寇在扬州两年来之战略与战术》一文：“……二十六年冬，敌天谷部队占我扬城，继占仙邵，烧杀奸淫，全世尽知！尤仙女庙地带，枪杀壮丁四百人以上。”（见该书45—46页）

三、一九五一年三月，《苏北日报》组成记者组专为调查了当年发生在万福桥的惨案，并在三月十三日第三版以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万福桥大血案》的长篇报道；在此期间，该报还刊载了万福桥惨案

中唯一生还的卞长福的控诉。事实证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日军在万福桥屠杀我四百多同胞一事确凿无疑。

四、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参考消息》，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第二版发表了取自《日寇侵华暴行录》一书的专稿：《日本侵略军在扬州万福桥的暴行》，文中除事件发生的时间记叙稍有误差外，其他各节（包括四百多人遇害）均与上述相同。

五、江都、邗江、扬州在解放后所征集和整理的党史和文史资料中，都有万福桥惨案的记载，只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遇害人数说法不很一致。经查阅有关的历史资料，研究各种不同说法，广陵区委党史办公室写成《万福桥惨案》一文，发表于《广陵史料》第十五期。

前些时候有所谓“持太阳旗欢迎”和“维持会成员”之说，这同一九八二年八月《邗江文史资料稿(4)》中《万福桥惨案一个幸存者的回忆》一文有关；但只要研究一下这位幸存者——杭田富的回忆，就不难看出这对万福桥惨案的定论毫无影响。为便于说明问题，特摘录其回忆中有关的一段：

“……大概是冬月十五这天麻花亮时，鬼子就押着我们从扬州向仙女庙进发，前头有马队开路，后头有步兵压阵。我们挑的是行李、餐具、子弹等军用物资。那时扬州和仙女庙之间不象现在这样交通便利，运河上只有摆渡，没有桥。当时走的路线是由东关出城，沿河这向北走，在五台山渡口过浮桥，再经湾头过河，走七闸于到仙女庙。走到五里庙时，有很多人拿着纸或洋布口袋做的太阳旗表示欢迎（据说这是卖国求荣的乡长石汉章和地主陈学顺用哄骗的手段组织起来的，共有二百多人）。这时日本鬼子又抓了这些欢迎的人当民夫，原来一个人挑的，现在人多了，就改成两个人抬了。大约在午后二时左

右，到了仙女庙顺允银楼，就将我们挑的东西全部卸在那里；在我们前面，还有一批被抓的民夫，也在这时和我们一道释放了。领队的日本兵，就发给我们一张证明，以便沿途查问；但由于人数众多，彼此不相识，也不知道证明在哪个手中。我们回来是由江家桥、头道桥、二道桥、万福桥这条路线走的。每过一道桥，东西两头都有岗哨检查，已经过了七道岗都顺利通过了，哪知到了万福桥上，准备过第八道岗时，突然不准通过了，只好听他摆布。这时日本兵就一个个的进行检查，看看头，看看手，有的还脱了衣服看肩膀。看过以后，就将其中一部分人抽出来站在南边，约有七八十人，我也是被抽出来站在南边的。当时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只看到桥上有张桌子，上面架了两挺机枪，已经吓得魂飞天外。后来日本鬼子把手一挥，叫我们站在南边的人走，这时才松了口气，赶快过桥向城里跑。快走到五里庙时，忽听得万福桥方向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当时也估计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幸事情，但没有想到会象后来所知道的那样惨。到了五里庙时，当地的人都回家去了，进城时和我同走的只剩下三个人，还不准进城；后来遇到“维持会”的人，才把我们带进城，到家已经黄昏时分了。第二天就听到说，万福桥下廖家沟里，到处都是浮尸，共有四五百人之多。我们缺口街保安堂救火会，共被抓去七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幸存下来，其余六个人都死于非命了……”

从以上的控诉中不难肯定三点：

① 拿着纸或洋布口袋做的太阳旗表示“欢迎”的人群，是汉奸乡长和地主用哄骗的手段组织起来的，事情发生在五里庙，而不是万福桥。至于这些人被抓去当民夫并遭枪杀，无疑是属于我无辜同胞遇害。

（下转第4页）

❀ 扬 ❶ 州 ❷ 盆 ❸ 景 ❹

·赵庆泉·

扬州是一座具有两千四百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宋朝时有“淮左名都”之称。扬派盆景相传在唐代开始流传，元明时已采用扎片的造型方法。清代曾盛行一时。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多处提到扬州盆景；郑板桥绘画中有梅花盆景。原存于天宁寺古刹，现陈设于扬州瘦西湖公园的一盆松柏盆景，从造型上看，可认为是扬派传统风格的代表作。可见扬派盆景的形成，当不迟于明代。

扬派的艺术特点可概括为“严谨而富有变化，清秀而不失壮观”，正如扬州的园林兼有北方之雄和南方之秀。旧时代扬州盆景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盐商、大地主、大官僚等有闲阶级，他们的审美情趣也影响到盆景艺术，扬派采用“棕丝精扎细剪”的造型方法，特别讲究功力深厚和自幼培养，以及“桩必古老，以久为贵；片必平整，以功为贵”的品评标准，都是与这种影响不无关系的。

扬派盆景以观叶类的松、柏、榆、杨（瓜子黄杨）为代表树种，多以高山上的松姿为表现题材。在树木造型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云片”。云片是用棕丝剪扎法，将枝叶扎成平整的薄片。一般顶片的形状为圆形，中下片多为掌形，犹如蓝天中朵朵白云。云片最初来自对

自然界树木形象的概括，如著名的黄山迎客松就是呈云片状的。云片也是吸取了山水画中远景树木的画法，它不求细节的描绘，而注重构成树冠的总体形象，装饰性很强，体现了绘画般的视觉效果。

云片的大小和多寡均视树形和植株大小而定。大者如缸口，小者如碗口，约一至九片。云片一至三层的称台式，多层的称巧云式。云片的安排疏密有致、高低相宜，散布四面八方，层次分明。云片极平整，如将满盘清水置于其上，也绝无点滴外溢。

根据中国画“枝无寸直”的画理，云片中的每根枝条一般都扎成很细密的弯曲蛇形，最密者每寸枝内达到三弯，且叶叶俱平而仰，平行而列，称“一寸三弯”。这种技法最适合用于瓜子黄杨等树种。

要将枝叶扎成上述的云片，极不容易，一般要经过多年的加工培养才能成型；成型以后，每年还要复片一至二次。至于剪扎的棕法，则有扬棕、底棕、撒棕、挥棕、绊棕、平棕、套棕、吊棕、下棕、连棕、缝棕等十一种之多，根据不同的树种、不同的枝条选用。剪扎的技术要求很高，故称为“精扎细剪”。这些年来，随着扬派的发展，剪扎技法上也有所改革。在不影响艺术效果的前提下，力求使技法简化，同时还学习了兄弟流派的经验。如培植榆、雀梅等树种，就吸取了苏派剪片的长处，采用剪扎结合，收到了容易成型的效果。

扬派的树木造型并不都用云片，而是因树处理。云片主要见于松、柏、榆、杨等树种。

与云片相适应的树木主干大多扎成螺旋弯曲状，势如游龙，变化多端，给人以曲线美，惯称“游龙弯”。扎的云片都放在弯曲的凸出面上，与弯曲的主干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显示出树木的苍古与清秀。

扬派在树木造型上讲究提根，即将树木的根部逐年向上提起，形成龙蟠虎踞之势。对提起的根还要进行精心的取舍和伸屈，使其与树木上部互有取势，达到苍古入画的效果。要培养提根，一般在栽盆时就将一部分根连土凸出盆面，日久后，下雨及浇水冲掉上面的土，根便自然露出。以提根为主要特点的树木，又称提根式。提根多用于六月雪、迎春、金雀、榔榆等树种，其他许多树种也可用。

“疙瘩”是扬派在树木造型上又一特点。即在树木幼小时将主干基部打一个结，或绕一圆圈，使成疙瘩形状，从而显示苍古和奇特。只绕一圈者称单疙瘩；左右各绕一圈者称双疙瘩；绕三圈者称三疙瘩。此法多用于观花类的梅和碧桃，松柏类及其他树种也有采用。以“疙瘩”为主要特点的树木可称为“疙瘩式”。

除上述特点外，扬派还有适于不同树种的悬崖式、过桥式、提篮式、垂枝式、顺风式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扬州盆景也在不断继承与创新。近些年出现的扬州水旱盆景就是对盆景形式的一种创新。扬州素以名园取胜，而名园又以叠石见胜。清初乾隆年间，曾盛极一时，大小名园，数以百计，扬州水旱盆景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它集中了树木盆景和山水

盆景之长，而形成自己的艺术特点。

一般树木盆景难以表现水边树木的清趣，而山水盆景又只能将树木作为点缀，因此都有着较大的局限性。扬州水旱盆景则能表现出最广泛的题材：江、河、湖、海、溪、潭、塘、瀑等各种水景，峰、峦、岗、壑、崖、岛、矶、坡等各种山景，以及各式各样的树景，从名山大川到小桥流水，从山林野趣到田园风光。水旱盆景还可通过水面部分的处理来表现各个不同季节的景色：春水涓涓，夏水横溢，秋水明远，冬水干涸。

自然界的景物，往往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传统画论将石比作骨骼，水比作血脉，林木比作衣服，又有“山因水活”、“树使石生”之说，也说明了自然界景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扬州水旱盆景的长处正是在于再现这种完善的景观，因此自然气息较为浓厚。如果再恰当地安置少许人物、建筑等小配件，还可表现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如清溪垂钓、柳塘放牧等。

扬州水旱盆景对于布局中的繁简，虚实处理很为有利。一般树木作为繁处，山石则是简处；树石为实处，水面则是虚处；旱地相对于水面是实处，而相对于树石又是虚处。这种繁简互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也是我国古典园林、山水画及许多传统艺术的共同手法，它可使整个盆景收到多样统一、意境深远的效果。

扬州水旱盆景的制作较为复杂，必须首先掌握树木盆景和山水盆

景的基本技术，再将二者结合起来。一般采用浅石盆，在准备作旱地的部分开洞以排水。用水泥将经过构思加工的山石固定在盆中，隔开水面与旱地，使之互不透水。旱地部分盛土栽种植物，并堆出起伏状的地形，上面再铺青苔；水面部分用来贮水，可大于、也可小于旱地面积，视表现内容而定。山石多用形态自然的硬质石料，如龟纹石、英德石等；也可用经过加工的松质石料，如砂积石、海母石等。用松石时需在近土的一面抹满水泥，以免透水，影响植物生长。植物以选小叶的树种如榔榆、雀梅、五针松、真柏、六月雪、虎刺、鸡爪槭等等，并加工成自然的大树形态，可孤植，亦可合栽。合栽大多采用同一树种，也有用不同树种的，但要有主次之分。

在扬州水旱盆景中，还有一种“旱盆水意”的做法，即采用浅口旱盆，在作旱地的部分堆土栽种植物和布置山石，作水面的部分凹下去，放进细白石子，表示水流，虽不贮水，却令人有流水之感。

水旱盆景表现的景物较丰富，在布局时，可以植物为主体，也可以山石为主体，但必须协调统一，共同为主题服务。

扬州水旱盆景是中国盆景特有的形式，在盆景已成为世界性艺术的今天，它正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受到国内外盆景爱好者的普遍的赞赏。

杨 氏 小 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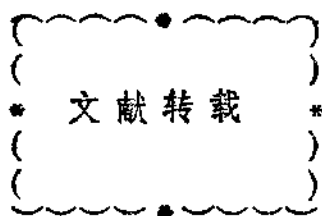
杨穆春

“杨氏小筑”座落在扬州市风箱巷，是扬州商业界人士杨伯威私人小花园，建于民国初年，由当时建筑名家余继之设计承筑。

该园仅约为六十平方米，而其中馆院齐全，亭、台、廊、坡，布置紧凑。有山水点缀，竹石幽隐，花木葱笼，鱼游池底。全建筑三分之一处，有花厅一座，名曰“全桂玉兰花馆”，暖阳轻风，冬夏咸宜。馆前仅剩余地有小园，园又为砖墙一劈为二，六角门洞，贯通内外，前院后园，各藏锦绣，前小后大。院内春有玉兰之芳，秋有金桂飘香。园右侧有斜廊，廊墙上有方亭、栏干，下通花馆。亭曰“猗香”，登亭眺望，如在名山古园中。园内假山洞称为“若谷”，鱼池号为“勺泉”；园中巨石矗立，命名为“独秀峰”。层次分明，多而不乱，小中见大，构思巧妙，实别具一格，可供当今寸金地者仿。

当时著名美术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曾率领学生来扬，请扬州名雕刻家黄汉侯先生介绍来园中绘画、拍照，有半个多月之久。众口皆誉，名噪一时。

现被扬州市文管会列为后批文物保管单位之一，并命名为“杨氏小筑”，则小园可长期保存，供后人游赏，不亦可偿当时主人之愿乎！



扬州警察

张治中

按：和平老人张治中，一九一〇年前后曾在扬州当警察。解放后，他写的长篇回忆录中有《扬州警察》一节，记叙了当年在扬州的生活情况和史公祠的情景。现转载于下。

（上略）

接到从前丰乐河私塾的一个同学方若木（合肥人，当时在扬州做警察巡长）一封信，说：扬州有一个巡警教练所招考，我可以进去；而且说，受训三个月当正式警察，慢慢可升巡长。我接到信后，以为这个巡警教练所一定是一个学堂性质，只要是这样，不管它几个月毕业，不管毕业后的出路是什么，能借这个机会离开安庆，是我很愿意的一件事。

我两去安庆，又再别安庆。临江的塔影是那样尖瘦，晓雾迷蒙，

江波浩淼，我带着痛苦和希望的心情，随着东流水又飘向扬州去了。

扬 州 警 察

离开安庆到了扬州，就进了巡警教练所。所址在史公祠，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史迹，我应该郑重地介绍一下。

可怜一代民族英雄史可法，忠骸混在死尸之中，因天气蒸热（扬州被清兵破城是四月二十五日），尸身腐烂，不能辨识，无法收殓。隔了一年，他的家人才将他生平所用的袍笏，葬在扬州城天宁门外的梅花岭。

出扬州天宁门有一座大庙，叫做天宁寺。寺东不远有一所破房子，褪了色的古木栏杆，这就是有名的史阁部祠——史公祠，史公的衣冠冢在祠内，梅花岭在祠后。

墓与祠向分两区，祠在西，墓在东，共由大门出入。入门有翠柏数株，昂然独立，与岭上的红梅遥相辉映，显示孤忠抗敌的精神。墓前杂植松柏梅花十数株。墓南有正厅三间，东有客厅五间，船厅七间，梅花仙馆一所，多已颓败。堂中悬有史公的画像，对联很多。其中有：“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由墓西北隅园门入，有长廊一道，壁嵌石碑很多，还有一个碑亭，中置崇禎年铸的铁炮一尊，是当时史公守城的工具。由正厅折而西入祠，有飧堂三间，中设史公牌位，两旁附祀诸人。这些屋宇都很荒凉。长廊外，梅花多株，间有樱花。梅花岭在祠的后面，要由祠外绕道而去，只有清潭一泓，垂柳数枝，土阜半堆，破屋两间而已。当日史公点兵，放炮，就在这一座土阜之上。所谓梅

花岭，传到后来，虽有疏落的寒梅数枝，但已无岭可登了。

虽然祠宇荒凉，颓败，冷落，而史可法爱国抗敌的精神和事业，永远是值得千秋万世崇仰的。

巡警教练所一共不过几十名警察学生。有一个所长主持，其地位等于巡官。所谓教练，非常简单，就是教你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这样三个月完后，我补上了一名正式警察。正式警察的任务，还是站岗，不过与上次在安庆所站的岗不同：上次站的岗是人家的岗，这次的岗是自己的岗。好容易我才有一个正式的自己的岗位。

站岗也常常被轮在晚上。我带着一支旧式枪，突兀地站在盐运使署大门口。这种夜岗，在冬天不知不觉地使人发生凄凉的情绪。有时站得很疲倦，偶然把上身依靠着门墙上，忽然下意识的警觉这是犯规的，站岗是不能打盹的，于是身子一下子就挺立起来了，告诉自己不能犯规矩，只好在大门口蹬蹬脚或是踱来踱去来取暖，来提一提精神。

当时一天只吃两餐，餐餐照例是黄豆芽汤一碗。吃得实在太厌了，有时我拿三五个制钱，买点咸萝卜下饭，这咸萝卜的风味是无穷的。

站岗不久，就调任勤务警察。好些同事羡慕我：“啊！升官了。”真是升官了吗？不是的，不过是不站岗罢了。任务是：外面来局“打官司”的，代为排解或报告上面；送贼来了，把他收下，拘留；登记户口，查户口跟着出去。专于这些日常事务和零星差遣，只是不站岗。一方面看来，从一个站岗警察调为一个勤务警察，算是幸运，确是从所谓优秀的警察中挑选上来的；而一按工作的实际，也不过是一个门房，一个传达罢了。